

# “尊严”的悖论：〈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自我困境探析

马纪晓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590；

**摘要：**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通过管家史蒂文斯的回忆与旅程，呈现出个体在职业身份与意识形态双重规训下的生存困境。本文基于异化与虚假意识理论，通过史蒂文斯的人生历程，探究其“尊严”悖论的生成机制与本质。研究发现，史蒂文斯对“伟大管家”的执念与对达林顿勋爵的盲目崇拜，本质是贵族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虚假意识产物，他将统治阶级的职业规范内化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形成自我合理化的认知体系，并在自我强化中加深其认知遮蔽，最终陷入难以挣脱的困境。这一探讨揭示了英国服务阶层在帝国衰落背景下的精神困境，也为解读石黑一雄作品的伦理主题与时代隐喻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长日留痕》；史蒂文斯；异化理论；虚假意识

**DOI：**10.64216/3080-1516.26.02.071

## 引言

作为石黑一雄“记忆叙事”的经典之作，《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凭借对历史记忆与个体命运的深刻叩问，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研究的经典对象。小说以 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的英国为时代背景，通过英国管家史蒂文斯穿越英格兰的旅程及其第一人称回忆，塑造了极具矛盾性的个体形象。小说围绕史蒂文斯的“尊严”执念展开，他将情感抑制、绝对忠诚奉为伟大管家的职业圭臬，毕生追求这套被定义的“尊严”，却在晚年面对“自己的一生可能是徒劳”<sup>[1]</sup>的虚无，这一自我认知与现实价值之间的断裂，构成了文本核心的阐释空间。

当前学界对小说的研究多聚焦不可靠叙述、身份认同、帝国怀旧等视角，多数研究侧重叙事技巧或聚焦时代背景，对“职业尊严”的解读多停留在个体选择层面。本文以异化与虚假意识理论为核心，补充现有研究对阶级意识形态规训机制的系统性分析，探讨史蒂文斯在阶级秩序下与自我劳动、情感乃至本真需求的疏离状态，以及其对贵族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化过程；同时结合“不可靠叙述”理论，揭示其回忆叙事中的认知偏差与价值遮蔽如何成为虚假意识的叙事载体并构建出服务于权力结构的价值信念，最终形成自我困境。这为史蒂文斯的命运解读提供更具深度的理论支撑，以个体困境折射时代困境，揭示二战前后英国传统价值体系解体进程中服务阶层的普遍精神迷失。

## 1 异化与虚假意识的理论逻辑及意识形态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异化理论与虚假意识并非孤立的概念，而是共同构成剖析阶级社会个体生存困境的理论工具，前者聚焦物质生产与现实生存层面的割裂状态，后者则阐释这种割裂得以形成并维系的根源。小说中管家史蒂文斯的职业生涯正是这种理论结构的文学具象，他接受的英国传统贵族阶级忠诚与尊严的价值观念，本质是服务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他无法掌控服务对象与目的，也无法从工作中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或自我认同，而这种认知与现实的错位，始终在史蒂文斯的回忆叙事中得到遮蔽与合理化。

### 1.1 异化与虚假意识的理论关联

从理论演进脉络来看，异化与虚假意识共同构成了剖析阶级社会个体命运的完整逻辑链。“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 alienation，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一条从霍布斯法权让渡到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反思，再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演进之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将异化从抽象哲学范畴锚定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揭示出劳动实践对人性的四重割裂：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生产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sup>[2]</sup>。这四重异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史蒂文斯身上相互强化，最终凝结为职业异化、情感异化、本质异化的现实困境。

史蒂文斯的异化并非凭空产生，虚假意识为其形成与维系提供了认知基础。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将自身特殊利益包装为社会普遍利益<sup>[3]</sup>，将服务于统治秩序的规范赋予“普世价值”的外观，使被统治阶级

形成与自身真实利益相悖的认知,并主动认同压迫自身的秩序,成为异化状态的共谋者。虚假意识为异化提供认知前提,引导被统治阶级主动接受规训,异化现实又反过来固化虚假意识,使个体在异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反思能力,强化既有认知来合理化自身处境。阿尔都塞进一步补充了这一逻辑,他指出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是将个体“建构”为主体,使其自愿接受社会从属地位,这也是史蒂文斯为何长期维持这种状态,他并非被动承受,而是在虚假意识引导下主动维系异化秩序。最终,异化结构与虚假意识在史蒂文斯身上形成了闭环,共同构成了史蒂文斯的个体悲剧。

## 1.2 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建构机制

文中史蒂文斯的虚假意识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建构的结果。在小说呈现的传统英国社会中,贵族阶级正是通过一套精密的机制,将服务于自身的规范包装为职业尊严,完成了对管家阶层的认知规训。

首先,贵族阶级借助制度化载体,将自身需求转化为“职业准则”,管家的行业规范、庄园的管理手册、以及代际传递的服务共同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这些惯例并非中立的职业指南,而是将贵族阶级绝对服从与情感压抑的需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史蒂文斯对“餐具距桌沿1英寸”“下午茶4点整送达”等规范的坚守,正是行为标准化消解管家的个体主体性的呈现,而他在回忆中刻意将这些机械规范美化为“职业尊严的核心”,正是不可靠叙述的呈现。虚假意识让史蒂文斯将统治阶级的工具性要求内化为自我价值追求,并在不可靠叙述之下固化这一认知。其次,“尊严”话语也通过日常的等级文化不断渗透,达林顿府所代表的英国传统庄园,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微型社会,贵族阶层无需借助任何暴力手段,仅通过服务的标准与专业度来便能强化职业尊严的认知。史蒂文斯对亲情人际的职业性认知,正是这种渗透的结果,而他叙事中对相关行为的意义扭曲,构成不可靠叙述的感知偏差,本质是虚假意识主导下认知遮蔽的叙事呈现。

虚假意识的巩固既依赖外部规训,也离不开史蒂文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当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出现偏差,便会形成不可靠叙述。史蒂文斯的叙事偏差恰恰是虚假意识主导下自我认知遮蔽的直接体现,他过滤掉负面信息,重构事件的意义,

将自身的异化行为包装为坚守“尊严”的正当选择,最终陷入了难以挣脱的生存困境。

## 2 史蒂文斯自我困境的文本具象

史蒂文斯的异化并非孤立的生存错位,而是渗透于其职业实践、情感世界与存在本质的全面困境。职业异化构成其困境的现实起点,消解了劳动的主体性与价值性,情感异化则切断了人与他人的真实联结,本质异化作为前两类异化的结果,彻底剥夺了史蒂文斯作为“人”的创造性与自我认知。

### 2.1 劳动价值的错位与主体性消解

劳动异化是史蒂文斯困境的起点,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异己化与劳动过程的被动化,源于他将贵族阶级的服务需求内化为“职业尊严”的虚假认知。异化使劳动产品“转化为独立于生产者的异己力量,最终反过来统治劳动者”<sup>[5]</sup>,这在史蒂文斯的职业生涯中得到印证。

史蒂文斯毕生追求的“伟大管家”的尊严,将其完美的服务视作劳动价值的实现,他倾注心血筹备达林顿府的国际会议,并将其视作职业成就的顶峰,坚信自己是在“服务世界正义与秩序”,但这场由达林顿勋爵主导的会议实质是纳粹势力的帮凶,史蒂文斯的服务也成为助纣为虐的罪证,而史蒂文斯在回忆中刻意放大“宴会流程零差错”“宾客高度满意”等细节,对宴会的本质避而不谈;虚假意识让他无法正视劳动的异化本质,并以不可靠叙述将异化劳动包装为“尊严”的实现。最终,当达林顿勋爵身败名裂、退出政治舞台时,史蒂文斯的劳动成果非但没有成为他价值的丰碑,反而异化为否定其职业意义的力量,使他晚年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毕生的努力,或许只是助纣为虐”<sup>[7]</sup>。这种劳动产品与自身价值追求的彻底背离,正是劳动产品异化的核心表征。

劳动过程的异化则进一步消解了史蒂文斯的个体主体性,将自由自觉的劳动沦为否定人性的强制活动。马克思强调,异化劳动会让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在父亲弥留之际,史蒂文斯面临亲情与工作的抉择时选择继续服务宴会,仅短暂抽空对父亲说了句“您感觉如何,父亲?我得尽快回宴会厅”<sup>[7]</sup>。对他而言,父亲的临终时刻并非需要珍视的亲情瞬间,而是影响服务水平风险,父亲的离世是职业精神的验证,这种将亲情置于职业规训之下的选择,本质是劳动

过程对人性的碾压,而回忆中的史蒂文斯将这一行为解读为践行职业尊严的必然选择,他的劳动不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对自身情感与人性的否定。这种异化并非被动承受,而是史蒂文斯的主动选择,他回避了劳动的异化本质,将压抑人性的劳动过程美化为“职业尊严”的实现,从而在认知层面合理化了劳动异化的现实。

## 2.2 人际关系断裂与情感机能退化

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与人相异化”在史蒂文斯的情感世界中呈现为亲情与爱情的双重断裂,他将情感表现视为不专业,将人际关系简化为职业功能,最终失去了与他人的情感连结,丧失了情感表达能力。

这种异化在史蒂文斯与父亲的关系中体现为一种职业性置换,父亲身为至亲,其角色却被职业引路人的身份所压倒,亲情关系在僵硬的上下级规范面前让位。父亲摔倒受伤后,史蒂文斯并非关心伤情,而是本能的评估“是否影响宾客服务”;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的不是父子间的温情诀别,而是父亲能否“保持职业体面”,血缘亲情在此被异化为纯粹的职业评价,而这种异化源于史蒂文斯内化的“职业尊严”规训,在他的认知中,完美管家的服务高于一切,亲情、悲痛等情感需求都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但史蒂文斯却将这些行为解读为职业素养的体现,重构父亲“你做得很好”的遗言意义,遮蔽了亲情异化的残酷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劳动让劳动者的情感不再属于自身,史蒂文斯的自然情感被职业功能消解。

这一异化逻辑在他与肯顿小姐的情感互动中进一步深化,肯顿小姐代表的鲜活情感世界,她手捧的鲜花、对书籍的好奇、对两人不同生活的探讨,一次次叩击着史蒂文斯封闭的内心。然而在职业尊严的规训下,他将所有这些情感的萌动都视为需要被压抑的“不专业”风险。他以“需检查餐具”的托辞来回应肯顿小姐的热忱,甚至得知她订婚时,说出的仍是“希望您新的家庭也能保持专业”<sup>[7]</sup>这样冰冷的职业祝福。这种主动牺牲情感幸福的行为,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劳动者的痛苦转化为他人的享受”的论断,他以自身情感的荒芜为代价,维系了达林顿府所代表的贵族阶级秩序的稳定,成为情感异化的主动共谋者。

## 2.3 本质异化:自我实现的剥夺

史蒂文斯的个体本质被彻底消解,自我完全被管家

的职业身份所吞噬,其劳动异化的持续深化与人际关系异化,最终指向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的彻底割裂。

类本质的丧失首先体现为创造性与自由性的消解,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的创造性与自由性。但劳动异化中“机械服从规范”的习惯与人际关系异化中情感压抑的状态,共同消解了史蒂文斯的类本质。从餐具距桌沿1英寸、下午茶需4点整送达,再到任何情况下不得表露个人情绪的行为准则,都是对刻板规范的机械重复与绝对服从。当府邸的新主人法拉戴先生提议史蒂文斯放松规矩、出去走走时,他陷入破坏职业尊严的恐慌,拒绝进行调整。在旅途中,他仍认为自己不过是在“坚守职业信仰的必然”,将机械服从等同于自我实现,史蒂文斯不再是具有创造性的人,他的工作不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单纯的生存工具。

这种创造性本质的消亡,最终导致了史蒂文斯职业身份对个体自我的完全取代,他将“达林顿府管家”这一职业身份内化为自我认知的核心。在旅途中村民问及史蒂文斯的业余爱好时,他陷入长久的沉默,最终只能茫然回应“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这一回答也揭示了史蒂文斯的精神困境,除了管家这一职业标签,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个体特质,没有爱好与情感,自我完全被职业身份吞噬。更深刻的是,这种工具化也渗透到史蒂文斯的精神领域,即便得知达林顿勋爵成为纳粹帮凶、身败名裂的真相,他仍试图通过修饰回忆美化雇主,将自己的服务解读为“对绅士的忠诚”,而非助纣为虐的错误。史蒂文斯的精神世界完全服务于“伟大管家”的身份建构,即便现实已经崩塌,仍拒绝承认自身的工具性本质。

## 3 结论

史蒂文斯的悲剧远非个人命运的偶然,而是异化与虚假意识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他毕生信奉的“伟大管家”式尊严,如同霍布斯鲍姆笔下的为回应社会变迁而人为建构的传统,贵族阶级将忠诚、敬业包装为不容置疑的职业信仰,催生了史蒂文斯的虚假意识,而他对这套职业准则的极致践行正是其主动将外在规训内化为自我约束,以职业身份压制情感与自我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始终通过不可靠叙述得以维系,他在遮蔽真相,局限感知,让虚假意识始终保持合理性,最终陷入迷失的困境。最终,当昔日辉煌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史蒂文

斯赖以生存的“尊严”话语也随之失效，其困境恰是二战后英国社会价值危机的微观映射，维多利亚时代遗留的贵族尊严与管家文化，本就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传统的发明”，在二战带来的社会结构重构中早已丧失合理性。但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的个体，仍执着于用旧时代的观念规训自身，试图在崩塌的传统中维系原有价值体系，最终只能在新旧秩序的夹缝中陷入认知迷思。

### 参考文献

- [1]Wall K.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ories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994, 24(1): 18-42.
- [2]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 李迅, 译.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35-260.
- [3]代显梅, 楚梦云. 古典与现代的调和: 以《长日留痕》论石黑一雄的尊严观[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06): 131-138.
- [4]吴子枫. 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 (05): 108-117.
- [5]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6]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7]石黑一雄. 长日留痕[M]. 冯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8]申丹. (2006). 何为“不可靠叙述”? 外国文学评论, (04), 133-143.
- [9]王冀平. 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J]. 世界民族, 2008, (06): 10-18.

作者简介: 马纪晓(2001.3-), 女, 汉族, 山东临沂,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